

■ 高教治理

DOI:10.15998/j.cnki.issn1673-8012.2023.04.007

课程思政政策内容特征、工具偏好 及优化建议



范卿泽, 黄 艺, 蒋 凯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 高等教育研究所, 重庆 400015)

摘 要:本研究以教育部和各省份课程思政建设政策为分析蓝本,基于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两个维度,通过词频分析、共词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构建政策“特征—着力点—使用工具”三维分析框架,挖掘课程思政政策内容的重点、特色及政策工具使用总体情况和选用困境。研究发现:(1)课程思政政策总体围绕“体系建设”展开;(2)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课程思政实践教育、研究平台搭建、教学实践等方面各有侧重;(3)各省份与教育部政策着力点具有较高的相似性;(4)从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来看,教育部和各省份对“学生”“高校”“教师”的关注程度略有差异;(5)各省份总体呈现以劝诫为“主流”、以制度建设为手段、以资源建设为抓手的政策工具使用偏好;(6)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差异显著,显现出3个“失衡”,即“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工具使用失衡,短期“激励”与“长期”能力建设工具使用失衡,体制机制建设和权力配置工具使用失衡。为此,需要从发挥政策整体效应、聚焦学生主体学习成效、细化建设内容要素、创新政策工具组合模式、增加政策工具供给、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等方面进行优化。

关键词:课程思政;政策内容;政策文本;政策工具;ROST 6.0;KHcoder;NetDraw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12(2023)04007911

修回日期:20221225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委普通本科高校课程思政专项重大委托项目“新时代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现状及对策建议”(221040);重庆市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课程思政专项重点课题“高校课程思政动力机制研究”(201079S);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高校工科类学科课程思政建设研究”(223002);重庆市教委教改项目“高等职业教育课程思政内生动力机制研究”(Z213245)

作者简介:范卿泽,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党委书记,研究员,博士,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蒋凯,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研究。

通信作者:黄艺,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教育管理和高等教育研究。

引用格式:范卿泽,黄艺,蒋凯.课程思政政策内容特征、工具偏好及优化建议[J].重庆高教研究,2023,11(4):7989.

Citation format: FAN Qingze, HUANG Yi, JIANG Kai.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tool preference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ed throughout curriculum policy [J]. Chongqing higher education research, 2023, 11(4): 7989.

一、问题提出

全面推进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这一战略举措,影响甚至决定着接班人问题,影响甚至决定着国家长治久安,影响甚至决定着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1]。课程思政脱胎于上海“学科德育”的实践探索,形成于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文件中^[2],在2020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指导下走向了体系化构建。政策在课程思政建设上发挥着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从现有的文献来看,2017年高德毅等总结上海经验,认为课程思政应“将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课程教学和改革的各环节、各方面”,为此提出了360度德育“大熔炉”式课程思政建设模式,强调树立“课程思政”核心理念^[3]。此后,学界展开了大量研究,学者们从“教育观”“教学观”“实践观”“综合观”等层面讨论了课程思政的内涵,论证了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4-6],揭示了课程思政的生成逻辑和价值逻辑。在教学实践层面,部分学者对课程思政建设现状、教学效果等进行探讨。韩宪洲提出了“专业思政”的实践之路^[7]。虽然课程思政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教师课程思政教学难点、课程思政元素挖掘与融合痛点、课程思政体系建设堵点等问题仍未解决^[8]。

教育政策工具研究是近年教育领域研究热点之一,但针对课程思政政策的研究则鲜有涉及。本研究以能公开检索到的与课程思政建设相关的教育部和各省份政策为分析蓝本,基于政策内容和政策工具两个维度,通过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构建“特征-着力点-使用工具”的三维分析框架,尝试对课程思政政策内容重点、特色及政策使用工具总体情况和选用困境进行解码,以期为后续相关政策的优化和改进提供参考。

二、研究设计

(一) 研究思路与方法

本研究对政策文本分析遵循以下思路:第一,利用ROST 6.0、KHcoder对政策文本进行处理,借用词频分析和共词分析,挖掘政策文本内容特征;第二,通过NetDraw社会网络可视化技术挖掘各省份课程思政政策着力点;第三,结合各类政策工具分类标准以及该课程思政政策文本内容特征,选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挖掘政策工具使用偏好和运用困境。研究思路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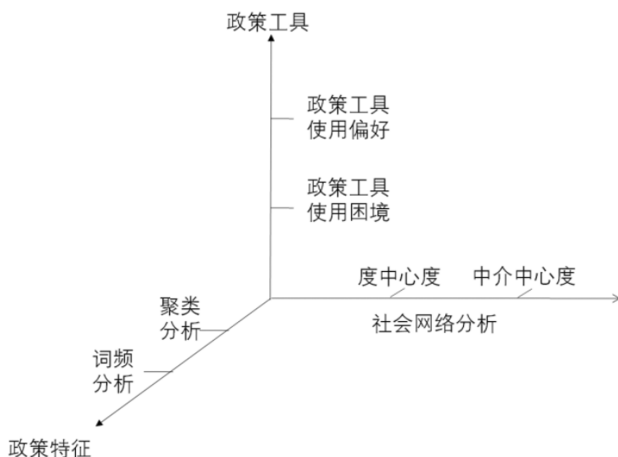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思路

(二) 数据来源

自2020年6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以来,各省份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推进课程思政建设的文件。本研究以2020年6月1日至2022年4月11日为检索时间,以“课程思

政”为关键词,在北大法宝及各地方政府网站进行检索,最终得到教育部及17个省份共19份含有具体措施的课程思政建设政策文件。

三、政策内容分析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9]。课程思政核心在“思政”,渠道在“课程”,具有政治性、思想性和价值性,其本质“属于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10]。课程思政政策是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和表征形式。课程思政政策的制定既受制于经济基础,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同时,不能忽视的是,良好的课程思政政策将有利于化解思想政治教育矛盾,引导学生的思想不断升华。我国各区域经济发展尚不平衡,这会影响到甚至决定着各区域的政策制定。因此,有必要对现阶段课程思政政策进行区域性分析,找到各区域课程思政政策的特点,为后期各区域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现状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打下良好基础。

分析关键词词频是探索政策文本内容热点词汇的重要方法^[11]。通过关键词词频分析可在一定程度上呈现政策文本信息的规律性内容。共词分析是两两统计一组词在同一个文档中出现的次数,并对这些词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反映这些词与词之间、主题与主题之间的关系^[12]。挖掘课程思政政策内容信息和主题结构是政策分析的重要内容。整理各省份课程思政的政策文件,按照各省份政策文本、东部地区政策文本、中部地区政策文本、西部地区政策文本4个类别进行划分。运用ROST 6.0软件对课程思政政策文本进行分词处理,去除无意义词汇,添加固定专业词汇,运用词频分析法,统计《纲要》及各省份政策文本中的高频词汇(见表1),再利用KHcoder软件进行共词分析,对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如图2)。

表1 《纲要》及各省份政策文本关键词词频情况一览表

序号	《纲要》		各省份政策文本		东部地区政策文本		中部地区政策文本		西部地区政策文本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关键词	频次
1	课程思政	57	课程思政	1105	课程思政	464	课程思政	273	课程思政	431
2	学生	42	高校	379	高校	154	高校	95	高校	152
3	高校	27	课程	275	课程	122	课程	70	课程	107
4	教育	23	学生	248	学生	121	学生	62	教师	77
5	课程	21	教师	203	教师	88	教师	47	教育	76
6	教师	12	教育	186	教育	65	教育	45	学生	74
7	问题	9	学校	99	学校	44	教学	25	教学	46
8	体系	8	教学	96	研究	38	学校	24	课堂教学	37
9	国家	8	指导	81	学科	38	思政	22	学校	34
10	课程教学	8	体系	79	教材	38	资源	21	思想	32
11	学科	7	思想	79	体系	37	成效	19	立德树人	31
12	能力	7	能力	75	教学	37	体系	18	能力	30
13	教育引导	7	课堂教学	75	特色	34	龙江	18	体系	28
14	专业课	6	学科	73	思想	32	能力	18	学科	25
15	意识	5	教材	71	能力	31	本科	16	评价	25
16	评价	5	创新	68	精神	29	教材	15	问题	24
17	思想	5	特色	65	评价	28	研究	15	组织	24
18	作用	5	评价	63	作用	27	思想政治教育	15	水平	23
19	马克思主义	5	成效	61	高等学校	26	特色	15	发展	23
2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5	立德树人	60	实践	26	课程思政研究	15	质量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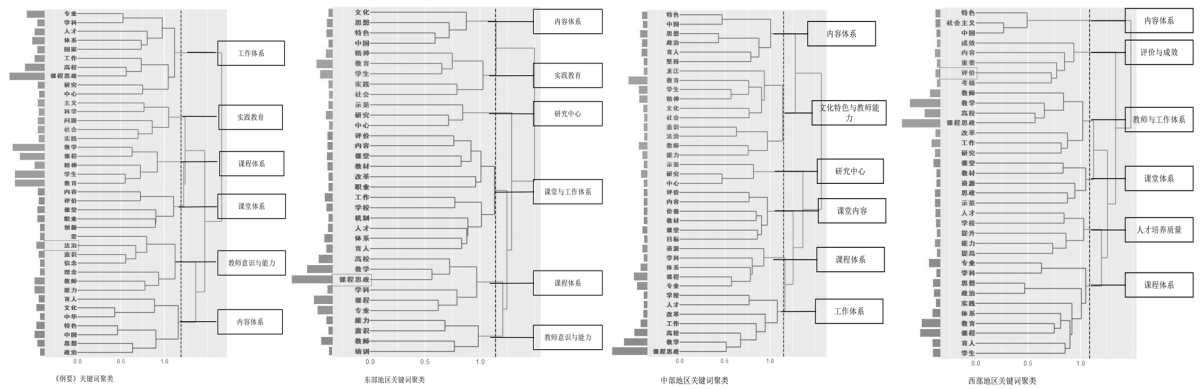


图2 聚类分析图

从词频统计数据来看,样本省份政策文本中的高频词与教育部《纲要》中的高频词高度吻合。“课程思政”“学生”“高校”“教师”“课程”的词频位列前五,成为政策关注的焦点。政策总体呈现以“高校”为主体、以“课程”为主要载体、以“教师”为关键要素的体系化“建设”特征。值得注意的是,从关键词词频对比来看,《纲要》更加强调整要以“学生”为中心,发挥课程思政的教育引导作用,科学设计课程思政教学体系,而各省份则更加强调整高校在推进课程思政建设中的主体责任。从共词分析来看,各省份课程思政建设政策与《纲要》相似度较高,宏观上对标《纲要》的建设内容,重点布局课程思政“内容体系、教学体系、工作体系”,形成3个类团。微观上内容体系涉及元素挖掘,教学体系涉及课堂教学、实践教育和评价考核,工作体系涉及课程思政研究中心建设。结合高频词统计结果发现,东部、中部和西部政策分区域呈现以下特征:

第一,东部地区强化实践教育和研究平台搭建。词频分析结果显示,东部地区排序靠前的关键词为“学科”“教材”“研究”,结合政策文本发现,东部地区以“研究”平台搭建为着力点,充分发挥研究的基础性、引领性作用,重视构建和完善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体系,在“学科”“教材”建设中推进落实课程思政建设要求。福建统筹资源重点打造一批国家级、省级、校级、院(系)级课程思政研究示范中心;山东研究制定各专业类别课程思政建设山东标准;天津重点关注各高校跨区域跨领域的合作交流,“坚持课程思政与通识教育、专业教学、实习实践、体育美育、科学研究等同向同行”;上海是最早开展课程思政实践的省份,在前期经验积累的基础上,进入课程思政建设研究2.0阶段,即“课程思政建设改革研究”。从聚类分析来看,东部地区突出了“课程思政实践教育”的主题,强调发挥好“第二课堂”作用,以增强学生实践能力,具体措施包括建立社会实践基地和结合专业实践、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等开展实践活动。此外,在实践研究方面,山东、天津等地鼓励普通本科学校依托课程思政专项课题深入开展研究。

第二,中部地区强化特色“元素”挖掘。从词频分析来看,中部地区以“思政元素”挖掘同课程思政研究、教学、教材相结合为重点,开展课程思政建设。河南聚焦于本科高校课程思政建设,重点打造“样板课程”“优质课程”,注重构建课程思政生态和完善课程思政教育教学体系。山西则以学科专业为基础分类,对各类高校提出建设要求,充分发挥各类“联盟”的平台效应,将挖掘同推介相融合。黑龙江、吉林更加重视区域内特色文化要素的充分挖掘和融合,分别以龙江“四大精神”和“五色”教育为重要载体,以省域内高校优秀教师典型事迹为重要抓手,特色化推进课程思政的内容建设。河北则深入挖掘河北省优秀人物典型事迹,将以李保国等为代表的感人事迹融入课堂教学中,教育引导学生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行业职业精神和职业规范。从聚类分析来看,中部地区在学生教育和教师能力培养两个方面均融入了地方特色文化,形成了“文化特色和教师能力”的类团主题,其结果与词频分析结果吻合度较高。

第三,西部地区以“教学”实践提升“人才培养质量”。西部地区政策文本高频词中“教学”相较于其他地区排序靠前,西部地区按照《纲要》要求,建设课程思政内容体系、课程体系、教学体系,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加强教学管理并提供保障措施。贵州将学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举措和成效作为省本科教学督查项目,加大督查力度;宁夏细化了教学体系层级,着力构建学校、院(系)、专业三级课程思政教学体系;四川以专业教育全课程、教育教学全要素、教学管理全过程为主要抓手,实施“课程思政百千万工程”,以“课程思政”为主线,融通“思政课程”,推动“专业思政”;云南提出以专业或课程为平台,围绕教学目标、课程管理、课堂教学、实习实训、教学考核等全面深化教学改革;重庆则创新性地提出设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教学研讨周”,通过课程思政教学比赛、现场教学观摩和典型经验交流等,示范引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同时强化标准建设,要求高校确保思政目标和思政要求在教学(课程)大纲、教案、教学设计等教学文件中有明确标准,健全课程标准审核和教案评价制度。从聚类结果来看,西部地区形成了“评价与成效”以及“人才培养质量”两个类团主题,强化了评价、考核与最终课程思政成效的联系,并进一步突显了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

四、政策着力点分析

关键词社会网络图可以展现政策着力点以及各着力点之间的相互关系^[13]。运用 NetDraw 软件对政策主题词进行网络可视化分析,得到《纲要》及各省份政策着力点网络图谱。

(一)度中心度

度中心度用来描述图中任一节点在网络中的核心地位,节点越大则度中心度数越大,其在网络中的重要性越大。从图3和图4可以看出,《纲要》中排在第六位的关键词分别是“建设”“课程思政”“课程”“高校”“学生”“教育”,而各省份政策文本中除“建设”“课程思政”排序与《纲要》相同外,“高校”的主体地位更加凸显,位列第三。关键词“学生”的排序则相对较低,与“课程”并列第四位。各省份政策文本中,“教师”的度中心度均进入前五,体现出“教师”在落实课程思政建设任务中的关键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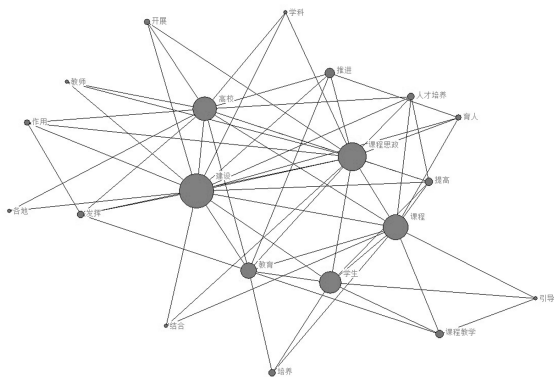


图3 《纲要》度中心度可视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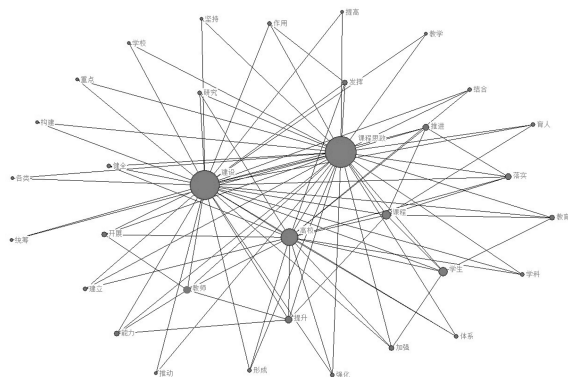


图4 各省份政策文本度中心度可视化图

(二)中介中心度

中介中心度是衡量社会网络中各子群之间起到连接和过渡的桥梁作用的节点重要性的指标,节点大小代表其重要程度,节点越大则越重要,即中介中心度高的节点是网络中的中枢节点^[14]。从各关键词的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来看,教育部《纲要》和各省份政策集合的网络特征高度一致,“课程思政”“建设”“高校”“课程”“学生”为重要节点,但排序略显差异。《纲要》以“课程”为课程思政建设的次一级关键节点,成为高校课程思政建设与人才培养的重要桥梁。各省份政策文本中“高校”则优于“课程”,成为连接“课程”“教师”与建设任务的桥梁,同时也是链接各省份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关键载体(如图5和图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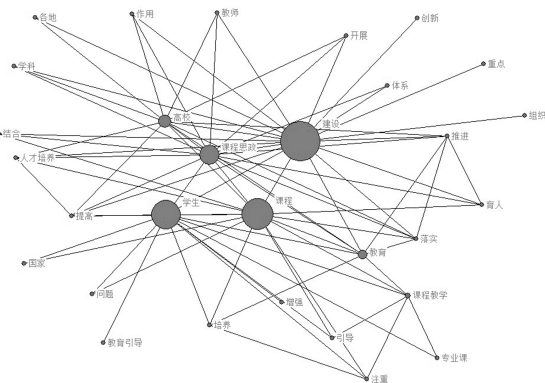


图5 《纲要》中介中心度可视化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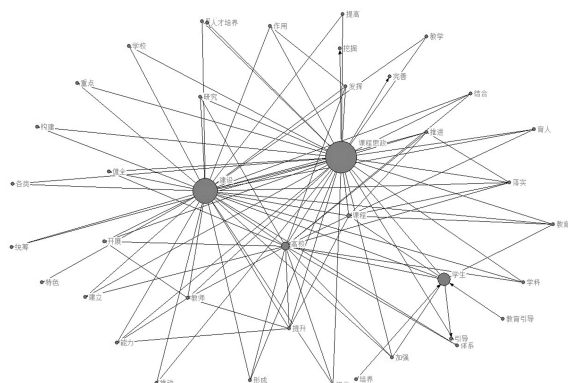


图6 各省份政策文本中介中心度可视化图

五、政策工具分析

政策工具的选用关系到政策目标的达成。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策工具研究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学和公共政策学研究领域的焦点,并成为一个新的学科分支或主题领域^[15]。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政策发生了较为明显的范式变迁,即由“效率理性”范式转向“市场选择”范式,进入新世纪以来逐渐形成“公共治理”范式^[16]。自20世纪末以来,学界在引介、消化国外理论与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国内政府管理的实际经验,深化了对政策工具基本概念、理论和方法的研究,取得了初步成效,特别是在宏观经济领域、环境保护领域和教育领域得到了广泛的运用^[17]。

根据分类标准的不同,政策研究者对政策工具进行了不同分类。豪利特和拉米什根据政府干预程度差异,将政策工具划分为自愿型、混合型和强制型三大政策工具类型。罗伊·罗斯威尔和沃尔特·泽哥菲尔德根据市场运行规律和政策作用面,将政策工具分为供给型、需求型和环境型。麦克唐纳和埃尔莫尔提出可选择的教育政策工具类型,即命令型、激励型、能力型和系统变化型。施耐德和英格拉姆将政策工具划分为权威型、诱因型、能力型、象征及劝说型、学习型5种政策类型^[18-19]。本文参考麦克唐奈、施耐德、陈学飞等人的分类法^[20-21],结合该研究政策文本的内容特征,将政策工具分为权威工具、激励工具、象征与劝诫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系统变革工具5种类型(政策工具相关解释见表2)。本文以分句为最小分析单位,按照“标题编号—要点—分句”进行编码,分析课程思政政策工具使用的总体特征。

表2 政策工具分类

类别	内涵	具体内容	表现形式
权威工具	政府为达到政策目标运用政府合法权威(包括许可、禁止或要求)规范个人和机构行为的规则	规定	对政策所涉的各级政府部门活动权限的规定
		许可	许可相关经费使用和相关人员的行为
		禁止	禁止相关经费使用和人员的行为
激励工具	指政府承诺目标群体在达成某一目标时给予其一定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具有诱导性、可选择性等特点	激励	财政激励、身份认定、获得声誉、身份优待,以及对个人或组织因从事工作获得的成绩进行物质奖励等
		收费	通过控制或收取费用来规制政策目标群体的行为
		制裁	通过严厉的惩罚来校准某种不符合政策导向的社会行为
象征与劝诫工具	政府通过价值呼吁或者典型塑造、象征声明和贴标签等策略引导目标群体采取与政策偏好相一致的行动	象征声明	政府提出政策目标,鼓励对政策的遵从、使用和支持
		基本原理	政策中对相关概念、基本原理与价值进行原理性阐述,旨在统一目标群体的价值观念
		劝诫	通过鼓励(包括树立典型)与劝诫加深对政策的理解

续表

类别	内涵	具体内容	表现形式
能力建设工具	政府通过向个人、机构或群体提供信息、培训、教育和资源等,帮助或支持目标群体采取于政策目标有利的决策和行为	贴标签	通过比喻或标签化的方式宣传政策偏好,在观念层面对目标群体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
		信息	为个人或机构获取与课程思政建设相关的信息搭建平台
		培训教育	通过培训、学习提高和培养人的能力
		资源	为个人或组织提供专门政策、专项财政补助与扶持,加强与政策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如科研装备、工作或生活基础设施建设等
系统变革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的核心是政府权威在个体和机构之间进行的权力转移	机构调整	主要包括新设、裁撤或合并机构
		制度建设	这里指与政策相关的人事管理制度、绩效考核制度、评价激励机制、教学管理制度等的建设
		职能转换	指职能的新增、转移或减少

(一)政策工具选用总体情况

5种政策工具在19份政策文本中均有所使用;象征与劝诫工具使用频次最多,为551次;系统变革工具使用频次为188次;能力建设工具使用频次为150次,在《纲要》政策文本中使用频次排位第三;激励工具和权威工具使用频次锐减,使用频次分别为55次和47次(见表3)。

表3 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汇总表

类别	象征与劝诫工具					系统变革工具			能力建设工具			激励工具			权威工具							
	总计	子工具				总计	子工具		总计	子工具		总计	子工具		总计	子工具						
		象征声明	基本原理	劝诫	贴标签		机构调整	制度建设		职能转换	信息		培训教育	资源		激励	收费	制裁	规定	许可	禁止	
教育部《纲要》	52	1	6	44	1	11	0	7	1	2	4	2	2	0	0	3	3	0	0			
东部	北京	43	2	0	41	0	8	2	6	0	2	0	2	2	0	0	1	1	0	0		
	福建	16	4	0	12	0	9	1	8	0	5	1	1	3	4	4	0	0	1	1	0	0
	河北	40	4	1	34	1	11	1	10	0	12	1	3	8	8	0	0	2	2	0	0	
	江苏	23	1	0	22	0	7	1	6	0	8	2	2	4	2	2	0	0	1	1	0	0
	山东	25	1	1	23	0	10	3	7	0	11	2	2	7	2	2	0	0	7	6	0	1
	上海	41	3	3	35	0	11	0	11	0	4	1	1	2	4	4	0	0	3	3	0	0
	天津	22	0	0	22	0	13	1	12	0	11	0	2	9	1	1	0	0	1	1	0	0
	小计	210	15	5	189	1	69	9	60	0	53	7	13	33	23	23	0	0	16	15	0	1
西部	甘肃	13	2	0	11	0	6	2	4	0	6	0	2	4	1	1	0	0	2	2	0	0
	贵州	40	8	0	31	1	14	0	14	0	6	0	1	5	6	6	0	0	4	4	0	0
	宁夏	8	1	0	7	0	11	1	10	0	6	0	1	5	2	2	0	0	2	2	0	0
	四川	22	2	0	20	0	10	1	9	0	4	0	1	3	2	2	0	0	2	2	0	0
	云南	27	3	0	24	0	5	1	4	0	5	0	0	5	2	2	0	0	1	1	0	0
	重庆	70	7	0	60	3	26	4	22	0	25	2	7	16	5	5	0	0	8	8	0	0
	小计	180	23	0	153	4	72	9	63	0	52	2	12	38	18	18	0	0	19	19	0	0
中部	河南	28	3	0	25	0	5	1	4	0	4	0	0	4	1	1	0	0	3	3	0	0
	山西	8	1	0	7	0	2	0	2	0	10	0	1	9	5	5	0	0	2	1	0	1
	黑龙江	43	4	0	39	0	15	4	11	0	13	2	2	9	3	3	0	0	2	1	1	0
	吉林	30	4	0	26	0	14	4	10	0	10	1	3	7	3	3	0	0	2	2	0	0
	小计	109	12	0	97	0	36	9	27	0	38	3	6	29	12	12	0	0	9	7	1	1
总计	551	51	11	483	6	188	28	160	0	150	13	33	104	55	55	0	0	47	44	1	2	

从政策工具的子工具使用频次来看,排前五的政策子工具分别为劝诫、制度建设、资源、激励和象征声明,其使用频次分别占政策工具总频次的48.74%、16.15%、10.49%、5.55%和5.15%,而职能转换、收费、制裁使用频次为0。5种类型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差异显著,使用相对不平衡。从组合形式来看,政策工具的使用总体呈现以“象征与劝诫工具+系统变革工具”为主、“能力建设工具”为辅的特征。从东、中、西部地区政策统计来看,各区域政策工具的使用偏好与教育部《纲要》基本一致,象征与劝诫工具、系统变革工具、能力建设工具、激励工具、权威工具使用频次依次递减。但中、西部地区在激励工具和权威工具的使用频次上略有差异,西部地区权威工具的使用频次多于激励工具。这表明西部地区更重视利用行政权威要求高校与个人加强课程思政建设,且贵州、宁夏、重庆等地在文件中明确规定了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内容。中部地区则更多地应用激励工具,以期提升高校与教师的积极性。

(二)工具选择的偏好分析

1. 偏好以劝诫为“主流”的象征与劝诫工具的使用

在课程思政全面建设的初期,政策制定者偏好使用象征与劝诫工具,目的在于引导所有政策主体提升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在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的基础上,通过劝诱、引导的方式促使政策执行主体自觉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同时搭配使用贴标签和象征声明子工具明确建设内容和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在19份政策文件中,仅河北、山东、上海的政策文件及教育部《纲要》运用了基本原理子工具,对课程思政“是什么”进行了概述。鉴于课程思政建设涉及专业课程、公共基础课程、实践类课程等概念范畴,内涵牵涉甚广,基本原理子工具使用的低频次降低了政策执行的精准度。

2. 侧重以制度建设为手段的系统变革工具的运用

系统变革工具成为课程思政政策文本使用的主要辅助性工具。其中,制度建设子工具使用频次占系统变革工具使用总频次的85.11%,机构调整子工具使用频次占系统变革工具使用总频次的14.89%。系统变革工具的使用旨在强调教育部、各地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和高校主体责任,构建多主体参与的工作格局,制定评价标准,建立和完善制度体系,从而对课程思政建设工作进行政策引导。各省份为将“三全育人”融入“课程思政体系”建设之中,提高政策执行效率,侧重使用了制度建设子工具,其内容包括建立课程思政集体教研制度、听课制度、考核评价体系、监督检查机制和制定建设方案、评价标准等。

3. 着重以资源建设为抓手的能力建设工具的应用

能力建设工具作为课程思政政策文本使用的次要辅助工具,较为全面地使用了信息、培训教育、资源等子工具,资源子工具使用频次占比(69.33%)具有绝对优势。各地通过编制学科专业教学指南、设立省级课程思政建设研究项目,建设示范课程和课程思政教学研究中心或省级课程思政教学研究示范中心等为高校提供专门政策和资源,扶持高校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培训教育作为提升高校教师课程建设能力的重要途径,其在能力建设工具使用的总频次中占比(22.00%)较低,这不利于从根本上提升教师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和能力。此外,信息子工具的相对缺乏,不利于个人与高校间进行沟通交流。

(三)政策工具选用困境

政策工具的选择和合理组合是取得理想政策效果和长远政策收益的关键。教育部及各省份政策文本中政策工具使用种类较多,但政策工具的使用频次差异显著,呈现出三个“失衡”,即“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工具使用失衡,短期“激励”与“长期”能力建设工具使用失衡,体制机制建设和权力配置工具使用失衡。

1. “柔性”引导与“刚性”约束工具使用失衡

象征与劝诫工具因具有成本低且应用范围广的优点,成为政策制定者偏爱的政策工具^[22]。发挥

政策的引导作用,有赖于良好的外部组织环境,但以引导和呼吁为主的象征与劝诫工具政策刚性不足,且发挥作用所需周期较长,短时间内难以取得良好的政策效果。

在政策文本中,权威工具的使用频次所占比重不到政策工具总频次的5%。《纲要》中明确规定,“建设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必须将思想政治工作体系贯通其中,必须抓好课程思政建设”。课程思政建设是高校开展人才培养工作必须履行的义务,但许可和禁止子工具的缺失,模糊了课程思政建设“红线”。课程思政建设工作协调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工作范围和职责尚未明确,组织效力难以充分发挥,这阻碍了当下高校课程思政“两张皮”“贴标签”等问题的解决。

2.“短期”激励与“长期”能力建设工具使用失衡

课程思政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高校、学生等“主体”的参与及其能力的提升,而课程思政建设意识和能力的提升需要短期激励与长期规划相结合。数据显示,在能力建设工具中资源建设子工具使用频次占主导地位。从资源依赖理论来看,高校与政府之间的非对称资源依赖关系易阻碍高校课程思政建设能力的提升,从而降低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激励工具使用频次与权威工具使用频次相对较低,表明政策执行缺失激励手段。在评价和激励政策内容中,激励工具虽使用了“奖励”“评优奖励”等正向激励工具,但激励工具使用总量上的低频化、正向激励“量质”的不明确以及负向激励工具的缺失,难以充分激发高校教师课程思政建设积极性,唤醒教师的“主体”意识,从而影响政策的执行效果。

3.体制机制建设和权力配置失衡

制度建设子工具的偏好使用构建了相对清晰的课程思政建设框架,机构调整也为课程思政建设顶层设计提供了一定的组织保障。但课程思政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学校、学科专业、课程、教材、教师、教学、科研等多要素,以及教学院系、教学管理部门、学生管理部门、后勤保障部门等多个部门,因此,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教务部门牵头、相关部门联动、教学院系落实且各部门职责职能清晰的课程思政协同工作格局是各项制度推行的前提。从政策工具统计数据来看,职能转换工具尚未使用,高校各教育教学相关部门参与课程思政建设的职能均未提及,新建设的组织机构或工作小组职能职责边界模糊,难以形成统一协调的工作机制。

六、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研究以教育部及17个省份19份课程思政政策文本为分析蓝本,通过词频分析、社会网络分析、政策工具分析,挖掘课程思政政策特征、着力点及政策工具使用偏好。从词频分析来看,现有相关政策总体上聚焦于强化课程思政体系建设,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在遵循教育部文件精神的基础上略显差异。从社会网络分析来看,各省份政策与教育部文件在度中心度、中介中心度两个指标上具有较高相似性,但在政策内容关注的主体和对象上略显不同。从政策工具分析来看,5种政策工具在政策文本中均有所使用,但使用频次差异显著,总体上呈现以劝诫为“主流”、以制度建设为手段、以资源建设为抓手的政策工具使用偏好,政策工具分布失衡问题较明显。因此,提出以下建议:

(一)增加政策工具供给,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

过度使用象征与劝诫政策工具难以推动“课程思政”建设走深走实,为解决课程思政认识肤浅化、项目实施碎片化、标准规范空心化等问题,政策工具使用需兼顾刚性约束和柔性引导,平衡短期激励和长期规划,进一步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一是适当降低象征与劝诫工具的使用频次,防止过度使用单一政策工具可能带来的政策工具单向性偏差。二是课程思政建设内容涉及教育主管部门、高校、教师、学生等多主体,要确保政策目标主体的政策行动与政策目标一致,适度增加权威工具的使用频次。在遵循思政教育规律基础上,针对教师添加许可和禁止子工具,明确课程思政建设底线,列出

政策执行主体行为“负面清单”,如有师德师风问题实行一票否决制度;许可课程思政建设督导组督促检查实施效果并参与评价考核;将高校课程思政建设情况和学风建设、校风建设相结合,将学生抬头率、到课率和学生点赞率的增量作为评估高校建设成果的参考指标。三是充分考虑政策实施的短期效应和长期效果,结合政策目标和内容适度提高激励工具、能力建设工具的使用比例,优化两者的组合设计,通过物质和精神激励,提高课程思政建设主体的意识和能力。如按专业类、职称层次以及教师能力划分培训类型和内容,提高培训针对性,增加能力工具使用频次。为不同能力水平的教师搭建平台,通过开展课程思政大比武以及设置专项资金资助课程思政科研项目等措施,进一步提升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四是在调整政策内容体量的情况下,优化各政策工具内部细分工具的使用结构,进一步明确课程思政建设路径和方向。

(二) 细化建设内容要素,创新政策工具组合模式

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等关键要素,分类细化教师队伍中公共基础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实践课教师以及专兼职教师在课程思政建设中的角色定位和职业要求,结合各类课程的特点对课堂教学全过程进行政策工具设计。一是细化课程思政建设政策,明确各项政策实施的时间节点,改进政策条款的模糊性表达,提高目标规划的精确性和行为激励性工具的使用比例,平衡各类政策工具使用频次,提升政策的可操作性和灵活性。二是落实资金、教育活动场地、设施设备等物质资源的供给,提高能力建设工具使用比例,增加教师培训教育类工具和信息工具的使用频次,提升课程思政建设能力。三是加强顶层设计,优化系统变革工具中制度建设、职能转换、结构调整等工具组合,明确政府、教育主管部门、学校相关部门的职能职责,发挥协同合力,支持课程思政建设。

(三) 发挥政策整体效应,聚焦学生学习成效

学生“成人”“成才”是课程思政建设的重要任务及职责,当前各省份政策更多关注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和教师三类主体,与《纲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存在差异,有关学生学习成效的内容所使用的政策工具较为单一,应加强对学生主体的政策工具供给。同时,应进一步建设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思政课堂教学“主渠道”,通过组织变革和借用信息技术等资源,促使课程思政融入课堂教学建设全过程。完善质量评价体系 and 激励机制,提高激励工具、能力工具的使用比例,在提高主体能力的基础上,通过明确的物质或精神奖励引导教师遵循育人与育才相统一的原则,促使教师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实践,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最后,运用系统变革工具,进一步完善监督机构的职能职责,加强对课程教学和评价工作的监测,推动课程变革和评价改革。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关于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的通知[EB/OL]. (20200601)[20221106].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2006/t20200603_462437.html.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发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J]. 中国高等教育,2004(20):57.
- [3] 高德毅,宗爱东.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从战略高度构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J]. 中国高等教育,2017(1):4346.
- [4] 张兴海,李姗姗.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四论”[J]. 中国高等教育,2020(Z2):79.
- [5] 唐德海,李泉鹰,郭新伟.“课程思政”三问:本质、界域和实践[J]. 现代教育管理,2020(10):5258.
- [6] 张正光,张晓花,王淑梅.“课程思政”的理念辨误、原则要求与实践探究[J]. 大学教育科学,2020(6):5257.
- [7] 韩宪洲.课程思政: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J]. 中国高等教育,2020(22):1517.
- [8] 蒲清平,何丽玲.高校课程思政改革的趋势、堵点、痛点、难点与应对策略[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2(5):105114.
- [9] 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6.
- [10] 葛卫华.厘定与贯通:论学科德育与课程思政的关系[J]. 中国高等教育,2017(Z3):2527.

- [11] 白滨,吕欣姗.国际继续教育质量评估的核心维度与启示:基于六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标准的共词分析[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24(3):8492.
- [12] 张宝生,张思明.基于关键词共现和社会网络分析法的科技产业研究热点分析[J].科技管理研究,2016,36(20):9398,142.
- [13] 王文,王纾.学习投入研究的知识图景及趋势:基于科学引文数据库的分析[J].教育研究,2021,42(8):7891.
- [14] 张双志.教育信息化2.0:议题构建与路径选择——基于政策工具分析的视角[J].教育学术月刊,2020(9):5763.
- [15] 陈振明,张敏.国内政策工具研究新进展:1998—2016[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6):109116.
- [16] 孟繁华,张爽,王天晓.我国教育政策的范式转换[J].教育研究,2019,40(3):136144.
- [17] 陈振明.寻求政策科学发展的新突破:中国公共政策学研究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J].中国行政管理,2012(4):1215.
- [18] 黄萃.政策文献量化研究[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8182.
- [19] 曲洁.义务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工具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13:23.
- [20] 陈学飞,林小英,茶世俊.教育政策研究基础[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253254.
- [21] 张菁珂,祁占勇.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及改进策略:基于施耐德和英格拉姆的分析框架[J].中国高教研究,2022(1):4955.
- [22] 刘声涛.新时代高等教育评价改革政策工具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22(1):8488.

(编辑:王茂建 校对:吴朝平)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Tool Preference and Optimization Suggestion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ed Throughout Curriculum Policy

FAN Qingze, HUANG Yi, JIANG Kai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Chongqing Academy of Education Science, Chongqing 400015,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takes the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nstruction policie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various provinces as the analysis blueprint. Based on two dimensions of policy content and policy tools, through word frequency analysis, co-word analysi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nd policy tool analysis, a three-dimensional analysis framework of policy “characteristics-focus-tools” was constructed to explore the focus, characteristics, and overall situation and selection difficulties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licy content.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firstly, the overal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olicy of the curriculum centers around “system construction”; secondly,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ave different focuses on building platform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n the teaching and practice; thirdly,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similarity between the policy focus of each province a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fourthl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gree centrality and intermediary centrality, there is a slight difference in the level of attention pai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various provinces to students universities and teachers; fifthly, overall, each province presents a preference for using policy tools with persuasion as the “mainstream”,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as the means, and resource construction as the focus; sixthly, the frequency of use of policy tools varies significantly, showing three “imbalances”, namely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use of “flexible” guidance and “rigid” constraint tools,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use of short-term “incentive” and “long-term” capacity building tools, and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use of institutional mechanism construction and power allocation tools. The suggestion is to leverage the overall effect of policies and focus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student-centered learning, to refine the elements of construction content and innovate the composite pattern of policy tools, to increase the supply of policy tools and optimize the structure of their use.

Key word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egrated throughout curriculum; policy content; policy text; policy tools; ROST 6.0; KHcoder; NetDraw